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9年6月5日 (第192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为何“科技冷战”的观点经不起推敲

目前美国国内流行的“科技冷战”的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除了怀旧的说法，“科技冷战”几乎缺乏冷战成功的所有关键因素。

强调“大国竞争”概念将使美国丧失最大竞争优势

多极体系、对规则的漠视以及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形式的对抗，是大国竞争的三个要素。当今世界政治不具备这三要素，把新时代与过去等同可能导致人们误解美国竞争优势的来源。

中美关系

美国应采取措施解决药物滥用问题而非一味要求中国

美国兰德公司网站 5 月 22 日载文称，中国近日宣布将芬太尼类药物列为管制药物的举措令人鼓舞，但此举可能难以阻止芬太尼类物质的流动，美国应思考能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国内滥用药物的问题。

中国并未禁止芬太尼，而是禁止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生产和处理芬太尼。拟定的禁令只适用于结构类似于芬太尼的合成阿片类药物，其他一些与芬太尼结构不同的合成药物则不在限定范围内。针对芬太尼的广泛限制还可能引发意外后果，如促进不在监管之列的化学品的的发展，从而重塑毒品市场。中国监管力量不足，监管设计和执法力度也参差不齐，芬太尼生产商可以设法规避监管。中国需要在执法上投入更多资源，并做出透明的承诺。

此外，其他国家也能满足美国对阿片类药物的巨大需求。假设中国对合成阿片类药物进行有效监管，印度或其他国家同样能够满足美国的需求。

在应对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中，美国不应只关注中国能做什么，而应该思考美国能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国内药物滥用问题，如采取设立监管消费场所并进行药物含量检测等干预措施。

美中关系的三种愿景

《福布斯》杂志网站 5 月 26 日登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小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菲尔·列维 (Phil Levy) 的文章称，由于特朗普政府未提出美中关系的

愿景，因此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缺乏战略明确性，事实上，美中关系有三种愿景。

首先是两个极端的愿景：一是让中国顺从，中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顺从美国；二是与中国分离，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美国试图将中国隔离。第一种极端愿景的问题是，中国不会接受，而第二种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中国经济体量太大、太重要，不容忽视，如果将中国拒之门外，美国企业和农民在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严重不利地位，而且当美国采取极端和不切实际的立场时，不可能团结到昔日的盟友。

还有第三种愿景，即以建设性和有效的方式塑造中国的行为，致力于制定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网络攻击、补贴和国有企业的全球规则。中国在世贸组织履行承诺的记录虽不完美，但可圈可点。

也许经过一段时间在两种不现实的美中关系愿景之间摇摆不定之后，美国可以努力在这两种愿景之间构建一个可行的愿景。

绝大多数在华美企表示美中互征关税带来负面影响

5月16日至20日，中国美国商会与上海美国商会联合对会员公司进行了调查，以评估美中两国互相提高关税对在华经营的公司的影响。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会员表示关税带来了负面影响。调查的主要结果如下：

关税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损害了在华美企的竞争力。绝大多数(74.9%)受访者表示，美中提高关税对他们的业务有负面影响，且对制造商的影响尤甚。关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产品的需求降低、制造成本上升、产品售价提高。

为了应对关税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美企开始采用“在中国，为中国(in China, for China)”战略(35.3%)，或者决定推迟

或取消投资(33.2%)。“在中国，为中国”战略是指在中国国内生产和采购，主要服务的也是中国市场。对于许多公司来说，该战略是理性的选择，能让自己免受关税影响的同时，能够继续在中国国内市场寻找机会。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3.1%)表示并未看到中国政府有增加任何非关税报复措施，约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审查增加(20.1%)、清关较慢(19.7%)。另外，还有人经历了许可证或其他申请批准放慢(14.2%)、官僚监管或监管审查增加(14.2%)。

约40.7%的受访者表示正考虑或已经将生产设施搬迁至中国以外的地区。对于那些将制造业迁出中国的企业来说，东南亚(24.7%)和墨西哥(10.5%)是首选目的地，而只有不到6%的企业表示考虑将制造业迁往美国。

如果美中两国在未来两个月内未能就解决贸易摩擦达成协议，那么受访者最关心的是双边关系恶化问题(52.7%)。42.7%的会员支持美中关系恢复原状，希望双方达成协议，恢复关税前的可预测性和中美贸易关系的稳定性。同时，53.3%的会员支持谈判继续朝着达成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协议的方向发展。

中美贸易战演变成事关科技未来的冲突

《华盛顿邮报》网站近日载文称，中美贸易冲突正日益演变成一场争夺先进通信和计算机技术控制权的科技战，这导致中美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扩展至国家安全和人权等敏感领域。

英国两大电信运营商近日同时宣布推迟发售华为5G手机，英国芯片设计公司ARM也宣布将暂停与华为的全部业务。未来美国政府还可能以为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大规模监控提供便利为由，对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等数家中国监控设备公司实施制裁。

特朗普政府还在其他领域采取措施，限制中美两国的商业联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5月9日一致投票反对中国移动向美国提供电信服务。美国商务部也正起草新的规定，进一步限制向中国出口量子计算、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14类先进技术。

一年多来，特朗普的安全团队一直在考虑对中国采取严厉措施，现在他们终于“如愿以偿”。5月15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授权商务部长罗斯禁止美国公司购买外国电信设备，以防止后者为美国网络带来“潜在性灾难影响”。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意在限制中国华为。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前工作人员戴维·汉克（David Hanke）表示：“贸易谈判破裂给国家安全鹰派人士提供了掌控局面的机会，而这只是开始。”

特朗普政府宣称，制裁是为了阻止中国企业在其产品中植入技术后门，从而消除中国政府在冲突时刻监视美国或扰乱重要服务的可能性。近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再次就“使用中国制造（无人机）技术的固有风险”向美国公司发出警告，并建议其采取措施降低风险。

虽然中国没有与美国同等的杠杆可使用，但中国当局有能力打击美国科技公司。稀土对于智能手机、电池和制导导弹等的生产十分重要，而中国稀土产量占全球90%以上。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主席罗布·阿特金森（Rob Atkinson）表示：“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主导地位可以成为其有利武器，因为稀土是许多先进产品的关键原料。”

中国还可以通过各种行政手段报复美国。中国美国商会（ACCC）的调查显示，在中美关税摩擦期间，每五家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中就有一家遭到政府额外的检查，其海关通关速度也大幅放缓。随着G20峰会中美领导人会晤日益临近，大多数美国分析人士认为，白宫方面仍希望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为何“科技冷战”的观点经不起推敲

目前美国国内流行的“科技冷战”的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除了怀旧的说法，“科技冷战”几乎缺乏冷战成功的所有关键因素。

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政策分析师詹姆斯·佩特库奇斯（James Pethokoukis）的文章称，目前美国国内流行的“科技冷战”的观点经不起推敲。

也许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贸易禁令标志着美国和中国之间开始了长期的技术“冷战”。华盛顿的反华鹰派人士当然希望如此。或许，确保世界进入第二个“美国世纪”最重要的方法是，将美国的科技行业（包括生产、投资资本、研究和工人）与中国完全分离开来，而第一步就是干掉可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技术公司的华为。

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付出了几十年的努力，美国人民清楚地看到了利益和代价。除了怀旧的说法，“科技冷战”几乎缺乏冷战成功的所有关键因素。

首先，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只是将华为禁令或对其他中国公司设限视为短期策略，目的是与北京达成更好的贸易协议。尽管特朗普称自己是“关税侠”，但他也是渴望连任的“股市侠”，可能不愿看到华尔街因不断升级的科技冲突而焦虑。的确，特朗普最近暗示，作为与北京达成贸易协议的一部分，可能会取消对华为的限制。

即使特朗普已下定决心要在这一新战线上作战，也需要向美国公众认真解释任何持续的经济冲突。他们应该了解广泛的战略、明确的目标和潜在的成本。与苏联的对峙意味着付出巨大的生命

和财富代价，并且面临发生核冲突的风险。华盛顿试图将美国的科技生态系统与中国分离的科技冷战，带来的痛苦将不仅仅是苹果手机以及其他消费品价格上涨。随着中国加快实现技术独立的步伐，美国各地的企业将遭受利润损失和市场损失。比较优势理论表明，对全球供应链的参与度降低，几乎肯定意味着美国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将下降。

尽管美国试图减少与中国的合作，但许多国家可能会深化与中国的关系。德国、法国和荷兰都表示，在 5G 网络扩张方面不会禁用华为的设备，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科学家将继续与中国科学家合作。“科技冷战”战士们是否考虑过，由于中国人在半导体行业等高级工程岗位中占比很高，在美工作的中国人减少将带来怎样的后果？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也会乐于接受中国最聪明的学生和最有技能的移民。

“科技冷战”的观点经不起推敲。但这不等于美国应该什么都不做。华盛顿应考虑禁止使用窃取的知识产权或技术的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或与美国公司合作。此外，限制中国获得关键军事技术或用于“内部镇压”的技术也完全合理。但如果一项政策的成功依赖于遏制、甚至孤立一个技术发达的超级经济体，那就不合理了。

美国外交

美选民担心特朗普处理贸易战的方式

美国 Axios 网站 5 月 20 日援引一项针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民调称，对华贸易战带来的经济影响、瓦解的盟友体系以及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摇摆选民在 2020 年大选中最关注的议题。

共和党与现任政府在国家安全议题上具有优势，但特朗普喜怒无常的性情削弱了这种优势。特朗普在国家安全议题上的支持率高于其整体支持率（44%）：在所有可能投票的选民中，55%的选民和63%的摇摆选民支持特朗普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表现。但涉及到具体的政策和行动时，特朗普的支持率有所下降。

选民倾向于支持特朗普外交政策的许多方面，如推动北约国家加大国防开支，试图与朝鲜进行谈判等。41%的人表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是他们再次投票给他的原因之一。46%的人表示，外交政策是他们将选票投给其他候选人的原因之一。但46%的人认为特朗普让美国变得更不安全，57%的人认为他使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更不受尊重，67%的人认为他“缺乏领导人气质”。

摇摆选民将“保护美国不受恐怖主义威胁”“使美国远离战争”和“捍卫美国价值观”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民调还显示，特朗普削弱美国盟友体系、包庇独裁者以及发动削减就业且推高物价的贸易战也是摇摆选民关注的议题。

特朗普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与摇摆选民相处得相当好，但这种支持似乎很脆弱。在2020年大选中，民主党人需要在上述议题上向特朗普提出挑战。

美专家：莫迪连任有助于稳定美印关系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印政策研究项目负责人、高级顾问理查德·罗索(Richard Rossow)撰文称，莫迪的连任将给美印关系带来至关重要的稳定性。文章摘要如下：

印度全国大选结果于5月23日公布，选民给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一个新的五年任期。自莫迪5年前上任以来，美印关系明显改善，但美印经济关系目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两国间的贸易争端似乎即将升级；美国打算取消印度的普惠制待遇；印度正考虑对一系列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多次威胁要设置新的签证限制，这可能会伤害到希望在美国工作的印度科技工作者及其配偶；美国正在敦促印度削弱其与伊朗的能源关系以及与俄罗斯的防务关系。

两国必须牢记，这些都是必须避开的短期障碍，尽管它们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政治代价。对印度而言，美国是印度最重要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市场；美国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美国是印度重要的发展伙伴；美国越来越多地为印度供应重要的军事技术。

对美国而言，印度是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印度是一个新兴的外国投资来源；在未来五年内，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按实际价值计算）；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之一，而美国正在扩大能源出口；面对“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印度正在成为地区稳定的新兴“堡垒”。

两国政府应迅速举行会谈，评估即将面临的障碍，并努力确保两国关系取得成功。尽管一些高级官员的职位可能发生变化，但莫迪的连任为美印关系带来了至关重要的稳定性。

价值观与美国的印太政策

美智库威尔逊中心网站近期登载该中心亚洲项目主任邓志强（Abraham Denmark）的文章称，特朗普政府试图解决价值观在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印太战略中扮演的角色，这反映出美国外交政策中一种长期存在的辩论。

5月11日在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演讲时，国务卿蓬佩奥呼吁美国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韩国等志同道

合的国家合作，并将该战略与“西方”价值观联系起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 4 月底在一个论坛上指出，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冷战”不同，因为中国“不是西方大家庭的一部分”。

蓬佩奥和斯金纳的言论表明，特朗普政府或者至少是国务院，意识到其外交政策包含意识形态成分。然而，他们将这些价值观描述为本质上是“西方的”，这可能会削弱美国政策的有效性。

首先，将人权视为“西方文明”的产物不必要地将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称为西方的一部分，忽视了它们自身的历史和传统。美国应该强调这些价值的普适性，政治自由主义与任何历史和文化都是兼容的。

其次，认为此类价值观无力对抗像中国这样的“独裁”政权也是一个战略错误。特朗普政府将北京拒绝接受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归因于文化和历史，这是一个重大错误。中国历史上并不乏呼吁民主和政治改革的例子。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价值观将成为美国具有重大优势的重要战场。美国对民主和人权的承诺是美国国际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美国“软实力”的根本动力。为了有效利用这些价值观，美国决策者必须对其基础有更深入的了解。

强调“大国竞争”概念将使美国丧失最大竞争优势

多极体系、对规则的漠视以及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形式的对抗，是大国竞争的三个要素。当今世界政治不具备这三要素，把新时代与过去等同可能导致人们误解美国竞争优势的来源。

兰德公司资深政治科学家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 Mazarr）近日在《外交事务》网站撰文称，尽管特朗普政府及美

国外交政策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但“大国竞争”并不能准确描述当今的现实，这种混淆概念的做法将使美国丧失最大竞争优势。文章摘要如下：

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至少华盛顿外交政策分析人士中流行这种看法。美国 2017 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 2018 年的《国防战略报告》都体现了这种思维的转变。《在政府之外，“大国竞争”的说法在过去几个月里也大量涌现。这种说法真的能准确描述当今的现实吗？

“大国竞争”描述的是一种特定的国家间关系模式，即 17 世纪到 20 世纪初大帝国之间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作为经济和政治大国崛起，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强势，这的确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个时代。但是，如今的新时代并不符合过去的模式。把新时代与过去等同可能导致人们误判当今威胁的性质以及误解美国竞争优势的来源。

典型版本的“大国竞争”描述了以下三种大国互动的特定方式：首先，大国竞争会创造一个动荡、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在这个格局中，主要大国面临着一系列强大的潜在敌人，并不断改变自己追随的对象；其次，在大国竞争时期，各国偶尔会达成规范各方行为的临时协议，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秩序机制仍然薄弱；最后，典型的大国竞争通常表现为军事竞争和冲突，经济、社会和文化冲突也会塑造这些竞争，但传统大国冲突的结果最终由大规模战争的前景决定。

多极体系、对基于规则的行为约束的普遍漠视以及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形式的对抗，是所有大国竞争时期都具备的三个要素。然而，它们都无法准确地描述当今的世界政治。

当前国际体系的结构从根本上来讲不是多极化的。尽管多极化的迹象的确越来越多但当前国际体系保留了冷战后单极时期的

许多因素，美国仍是主导力量。与此同时，这个新兴体系具有两极化的要素：美国和中国显然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美竞争将在塑造世界政治进程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此外，如今国家展开竞争时，会受到制度、规则和规范的约束，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大国竞争截然不同。如今，大多数主要大国都是成熟的工业民主国家，追求稳定和繁荣，没有领土野心。由组织、条约、非正式程序和许多其他限制组成的密集网络管理着大国之间的关系。战后秩序虽不完善，但催生了历史上制度化程度最高、规范性最强的国际体系。重要的是，这一秩序不是强加给一群不守规矩的“闹事者”，而是反映了各国对和平、稳定和繁荣的追求。

此外，“修正主义”国家表达对现实不满的方式并非大国竞争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军事形式。受核革命的影响，赢得征服性战争根本不现实。除了核武器，民主、繁荣和经济相互依存等因素还将人们引领到一个军事冒险主义极为罕见的时代。今天的竞争几乎总是发生在经济、政治、文化和信息领域，而不是现实战场上。

把当今的国际关系描述为大国竞争的状态不仅不准确，而且很危险。把竞争对手视为自己的镜像，将阻止美国政策制定者做出重要的区分。把这个新兴时代视作传统的大国竞争时代，不仅会掩盖竞争对手之间的重要差异，还会导致政策制定者过分强调用军事实力推进美国利益。

最后也是最危险的是，大国竞争的框架可能导致美国丧失领导那些利益一致、遵守规则的国家集团所带来的巨大权力。已经有迹象表明，美国不再重视其国际秩序领导者的角色。放弃这一角色，就等于放弃了大国的最大竞争优势。

美国政治/其他

美“千禧一代”希望 2020 年大选有人挑战特朗普

美国 Axios 网站 5 月 23 日登载芝加哥大学 GenForward 项目发布的民调结果称，大多数“千禧一代”（76%）希望，在 2020 年大选中能有其他共和党竞选人挑战特朗普。文章摘要如下：

“千禧一代”对所有民主党竞选人也不甚满意。30%的受访者表示，会支持其他竞选人而非目前领先的 13 名民主党候选人。超过 40%的人表示不喜欢 9 名可能挑战特朗普的共和党竞选人，包括副总统迈克·彭斯、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参议员米特·罗姆尼、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和前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

2016 年，仅 37%的“千禧一代”支持特朗普。相较于 2016 年，“千禧一代”在 2020 年大选中所占的比例将有所降低，但他们仍是各方重视的投票群体，尤其是民主党。GenForward 的民调显示，年轻选民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尤其是那些容易被说服的无党派人士。

气候变化和医保是所有群体关注的首要议题，但不同党派成员之间存在差异：民主党人将气候变化、医保和收入不平等列为其关注的首要议题，无党派人士将医保视为最重要的议题，共和党人则把移民问题视为首要议题。

美媒：特朗普推特的冲击力下降

Axios 网站 5 月 27 日载文称，如今特朗普的推文不像他上任伊始那样具有冲击力。专门提供社交媒体分析工具的开发商 CrowdTangle 的数据显示，特朗普在推特上的互动率（衡量他发

了多少推文、有多少人关注他)急剧下降。

数据显示,特朗普推特的互动率从他当选那个月的 0.55%下降到了 2017 年 6 月的 0.32%,而今年 5 月(截至 25 日)的互动率已经降为 0.16%。这表明特朗普最强大的沟通工具可能正在失去效力,新鲜感已经消退。特朗普发推的频率在其总统任期内有所上升,从他上任头 6 个月的每月 157 次上升到过去 6 个月的每月 284 次。而他发的推文越来越多,任何一条推文脱颖而出的可能性就越低。

《多伦多星报》华盛顿分社社长丹尼尔·戴尔(Daniel Dale)认为,特朗普的攻击路线已经重复太多次,以至于它们不再令人震惊。戴尔表示,由于打破常规的推文已成为一种新常态,他不再经常对此进行报道,因此,普通读者了解的也就更少了。

例如,特朗普攻击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变成了例行公事,指责政府官员叛国从具有开创性变成司空见惯。自今年 4 月 1 日以来,特朗普推文中,“没有结论”出现 54 次、“没有干预”30 次、“政治迫害”20 次、“欺骗”19 次、“‘激进’左翼/民主党人”17 次。

佩洛西在弹劾问题上的七个重要盟友

《国会山报》网站 5 月 27 日载文称,尽管过去数周中越来越多民主党议员支持弹劾特朗普,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仍对启动弹劾程序持审慎态度,她在弹劾问题上的 7 个重要盟友: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佐伊·洛夫格伦(Zoe Lofgren):“我们必须到法庭上诉、强制执行传票、获得证据并找出事实,这样我们才能了解状况。我认为启动弹劾程序只会混淆问题,在很多方面损害了我们的利益。”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伊莱贾·卡明斯 (Elijah Cummings): “民主党能在法庭上获得成功。我认为法院会维护法治。”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成员罗·卡纳 (Ro Khanna): “我们需要更有条理, 并提供证据。我担心弹劾总统将进一步撕裂美国, 而不是治愈美国。”

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会议主席、司法委员会成员哈基姆·杰弗里斯 (Hakeem Jeffries): “我们 (民主党) 之所以在众议院获得多数席位, 是因为我们很多议员致力于使美国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 而不是关注弹劾、勾结或妨碍司法。”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成员格里·康纳利 (Gerry Connolly): “我不认为我们需要到法院启动弹劾调查, 以证明调查是正当的。”但康纳利也指出: “目前民主党发现的证据可能导致弹劾, 特朗普让不想越过弹劾这条线的人更加难做了。”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成员凯蒂·希尔 (Katie Hill): “将弹劾调查作为一种法律策略有风险, 此举可能会让民众认为民主党人将投票弹劾特朗普。但弹劾调查并不能在法庭上给我们更多杠杆。这就是我们必须谨慎行事的原因。”

进步党团会议副主席约翰·丁格尔 (Debbie Dingell): “我们必须做好基础调查, 并做好监督工作。民主党人需要继续关注他们所关注的政策问题, 而不是通过弹劾进一步分裂美国。”

皮尤研究中心：美国亚裔群体之间存在哪些差异？

皮尤研究中心网站近日载文称, 在美国, 亚裔是增长最快的主要族裔, 目前有超过 2000 万亚裔生活在美国, 主要来自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 他们在收入、教育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发现, 美国不同亚裔群体之间的主要存在以下差异:

第一,规模。截至 2015 年,原籍国为中国(23%)、印度(19%)、菲律宾(18%)、越南(9%)、韩国(9%)和日本(7%)的亚裔占全部亚裔美国人的 85%。这些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亚裔美国人的总体人口特征。其余 13 个亚裔群体各占美国亚裔人口的 2% 或更少,且这些群体有许多不同于较大群体的特征。

第二,受教育程度。2015 年,在 25 岁及以上的美国亚裔中,约有一半人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比例高于其他族裔,但具体情况因原籍国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与其他亚裔群体相比,原籍国为印度(72%)、马来西亚(60%)、蒙古(59%)或中国(53%)的亚裔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的可能性更大。相比之下,原籍国为柬埔寨、老挝和不丹的群体中,只有不到 20%的人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在 25 岁及以上的美籍人士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

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移民给美国带来的教育水平。例如,2015 年,72%的印度裔美国人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持 H-1B 签证等高技能工人签证抵达美国时就已经拥有学士学位。自 2001 年以来,一半的 H-1B 签证发给了印度人。

第三,英语水平。五岁及以上的亚裔美国人中,70%的人英语流利。2015 年,绝大多数日裔(84%)、菲律宾裔(82%)和印度裔(80%)英语熟练。相比之下,不丹裔(27%)和缅甸裔(28%)的英语熟练程度最低。

第四,收入水平。总体而言,亚裔是收入不均发展速度最快的族群,不同亚裔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大多数亚裔群体的家庭收入低于整个亚裔群体的平均水平。2015 年,美国亚裔家庭年收入中值约为 7.3 万美元,高于美国家庭的整体收入水平(5.36 万美元)。不过,其中只有 4 个亚裔群体的家庭收入中值

超过了全美亚裔家庭的水平：印度裔（10 万美元）、菲律宾裔（8 万美元）、斯里兰卡裔（7.4 万美元）和日裔（7.4 万美元）。相比之下，其他 15 个亚裔群体中的大多数收入远低于整个亚裔的水平，其中，华裔家庭收入为 7 万美元，而中位数最低的两个群体分别为尼泊尔裔（4.35 万美元）和缅甸裔（3.6 万美元）。

第五，贫困率。2015 年，亚裔总体贫困率为 12.1%，比美国整体贫困率（15.1%）低 3 个百分点。在所有亚裔群体中，不丹裔（33.3%）和缅甸裔（35.0%）的贫困率最高，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也是菲律宾裔和印度裔（均为 7.5%）贫困率的四倍多。

第六，移民比例。2015 年，美国所有亚裔中近 60% 的人出生于国外，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同年美国的整体移民占比（13%）以及其他族群的移民占比。但并非所有美国亚裔群体的移民占比都很高。例如，19 世纪，第一批日本移民作为种植园工人来到美国的夏威夷州，但 2015 年，日本移民比其他亚裔移民少得多，移民在日裔美国人中的占比为 27%。

一些亚裔群体移民到美国的时间比其他群体晚。例如，美国 85% 的缅甸裔出生于外国，他们中的许多人从 2007 年开始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81% 的缅甸裔移民在美国生活的时间约为十年甚至更短。相比之下，64% 的日裔移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 10 年以上。

第七，入籍率。在亚裔移民中，58% 的人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但入籍率相差很大。近 80% 的苗族裔（Hmong）和越南裔是美国公民（分别为 77% 和 75%），是美国亚裔群体中入籍率最高的。入籍率的差异反映出移民在美国生活时间的差别。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大批越南人和苗族人作为难民来到美国，因此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入籍。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